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鸿篇巨制

——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略评

严清华 郭笑撰

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自199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卷之后,接着又于1995、1997、1998年相继出版了第2、3、4卷,这样,作为《通史》上篇的古代部分,其工程也就大功告成了。《通史》古代部分所总结的是中国先秦以迄鸦片战争前的经济思想。其中,第1卷论述从夏商至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第2卷论述自西汉晚期至唐代中叶的经济思想,第3卷论述唐中叶至元明之际的经济思想,第4卷论述明清时期的经济思想。根据作者的计划安排,《通史》下篇还有两卷属于近现代部分的内容,将论述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思想。整个《通史》纵贯中国数千年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通古今之变”,是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的大型学术专著。综观全书,《通史》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与意义:

一、整套《通史》工程浩大,论列人物阵营强大。《通史》全书六卷,洋洋洒洒,气势恢弘。与同类成果相比较,无论是字数,还是所论列人物和引用的资料,恐怕都无有出其右者。《通史》仅前四卷就已达180余万字,在同类著作中篇幅最大。在此之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古代部分最著名的著作是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上、中、下册,共120余万字。胡先生的著作在60年代和“文革”结束后一直是国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品牌”作品。赵先生主编的《通史》则在新的层次上发展了胡先生著作的研究成果。《通史》中所论列的人物是所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最为齐全的,许多人物的经济思想被第一次系统展示,有的人物还属于首次“亮相”。例如,春秋时期的孙叔敖、姬扎、羊舌肸;西汉末期的谷永、鲍宣;东汉的何休、司马朗;魏晋的嵇康、阮籍;唐代的郭威、柴荣;宋代的叶梦、康与之、苏云卿、杨冠卿;辽、金、元时期的耶律昭、高汝砺、刘秉忠、阿合马、桑哥、高则诚;明清时期的解缙、王叔英、恽敬、朱载堉、薛论道、徐世麒等。据统计,仅《通史》前四卷目录中列出的人物即达150多位,阵营之强大可想而知。

二、《通史》是一部历史性的代表作,具有承接历史,开创未来的重要意义。《通史》前四卷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最为全面系统的总结,是20世纪末中国经济思想史古代部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我国自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开始意识到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性以来,每个历史时期都出现了相应的代表作。我国最早正式以中国经济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其代表作是甘乃光发表于1924年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一书,该书开创了我国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此后,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不断涌现,如1926年李权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30年熊梦的《晚周诸子经济思想》,1936年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先秦部分),1939年赵丰田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48年夏炎德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等。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工作者当推唐庆增,他除了出版上述专著外,还发表了20多篇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论文,并在高校连续数年讲授这方面的课程。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先秦部分)是当时篇幅最大、资料最多、论述最详的一部著作,可视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一项具有总结性

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1959年由巫宝三先生等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历史遗产的资料书,也是解放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方面研究取得的第一项成果。1962年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先秦部分)得以出版,1963年又出版了中册(秦汉至隋唐部分),并于1965年完成了下册(宋至鸦片战争前)的撰撰,下册于1981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最具开拓意义的一部历史性著作,是我国学术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出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并且它还开始改变了解放前古代部分研究仅限于先秦的状况。在这些中国经济思想史大家的带动下,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从“文革”开始,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又一次走向低潮,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恢复。这一时期,不仅巫宝三、胡寄窗、陈绍闻、侯厚吉、马伯煌、叶世昌、李守庸以及包括赵先生本人等在内的一大批老专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学术阵地大显身手,而且像吴申元、谈敏、王毅武、郑学益、叶坦、唐任伍、赵晓雷等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也极为活跃。但就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而言,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以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先秦部分)为代表性成果,60年代以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为代表性成果的话,那么,90年代则以赵先生的《通史》为代表性成果。《通史》总结了整个20世纪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学术心得,它的出版为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通史》后两卷将在21世纪初完成。因而,《通史》可以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跨世纪作品,它既是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又是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

三、《通史》凝结了赵先生毕生研究的心血,是总结作者们学术观点的成果。赵先生40年代前期即开始接触经济思想史,从那时起就萌发了要总结中国人自己的经济思想史的愿望。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如愿。新中国成立后,赵先生先是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50年代才开始转向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1964—1965年,赵先生和易梦虹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分册陆续出版。这是解放后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教科书,1980年,此书被修订后再次出版。此后,赵先生于1984年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年又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从而基本上形成了赵先生自己的学术风格、理论观点、论述方法和结构体系。1986年赵先生还出版了经济管理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经济管理思想的研究,1988年他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1993年主编出版了《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在文献资料的整理、编集方面,1982年出版了他和易梦虹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这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中编出的第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汇编。1985年,他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出版,这是一部关于古代经济思想资料的精选本。正是在以往所取得的成就的

减灾防灾: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探索

——简评陈文科等著《农业灾害经济学原理》

夏振坤

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陈文科等撰写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农业灾害经济学原理》一书,已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为基础理论奠基的著作。它将对农业灾害的研究视点定位于农业灾害经济规律,从而较好地弥补了农业经济学和灾害经济学研究的不足,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农业灾害经济学理论体系。该专著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立意创新。灾害是影响一国或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减灾防灾历来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农业作为一个受灾害影响严重的产业部门,减灾防灾更是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为此,近年来有关灾害经济学的研究日益兴起。但把减灾防灾和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却并不多见。为此,本书从农业防灾减灾出发,把防灾减灾和环境、生态、资源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联系起来,不仅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且把减灾防灾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如书中所说,防灾减灾是大国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减少灾害损失的重要途径;防灾减灾是大国保证农业稳步发展,满足社会再生产和人类生态需要的客观要求。正因为如此,防灾减灾也就成为了大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是体系完整。作为一本专门探讨农业灾害经济的专著,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完整。在本书的三篇十五章中,作者从农

业灾害经济学的一般问题谈起,对农业灾害的发生类型、形成规律、影响因素、防治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本书对农业灾害规律的分析可以说十分全面。在书中,作者不仅对灾害的形成规律、发生的多样性以及灾害的经济危害性规律进行了分析,而且对灾害的害利互变规律、灾害发生的区域性规律,以及灾害的防御规律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填补了许多理论研究上的空白。

三是观点独到。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作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在农业灾害的防治对策中,作者不仅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灾害防治的指导思想,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减灾机制,即以农业保险机制为主体,辅以政府救济和社会援助的具体减灾机制。作者认为,农业保险不仅可以分散农业灾害带来的各种风险,减轻灾害造成的后果,而且可以保证灾害后较快地恢复生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效的农业减灾机制。但由于灾害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仅仅依靠保险还不能完全有效地防灾减灾,必须辅之以政府的救济和社会的援助。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 430077)

(责任编辑:王冰)

基础上,赵先生才能在反复研究、讨论、考订、充实的前提下,组织力量进行《通史》的编写工作。因此,可以说,赵先生的这部著作是在全面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对作者们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深化和总结。

四、《通史》用典详实,但绝对不是资料的简单罗列或堆砌,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窥探中国经济思想史堂奥的一部力作。《通史》古代部分的整个写作过程都始终围绕着一主线——封建主义生产的目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是中国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态下的经济思想。这些社会形态下所生产的不是商品的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它们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形态以土地财产和农业经济为基础,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原始公社解体以迄资本主义之前各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共同规律。在我国这个封建社会存续了几千年的国家,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封建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由于封建的土地财产和封建性的农业构成封建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研究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必须从分析封建社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我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着极为明显的中国特色,与西方相比,我国实行的主要不是领主所有制,而是地主所有制,地主所有制的上层建筑是中央专制集权的封建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不仅表现为地租这样一种形式,而且还包括赋役这一形式。《通史》将这一情形概括为“地产——地租、赋役”模式,并以此为主线对中国历史上有关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与分析。在《通史》中,中国历史上所有思想家们的经济思想,无论是零星分散的,还是系统丰富的,无论是直观简朴

的,还是精辟深刻的,都围绕这条主线而聚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彩又彼此相联的经济思想体系。这表明《通史》不仅注重从时间上把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思想都涵盖进来,而且将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形成一个系统,亦即不但实现了时间上的“通”,而且更注重在探讨历史规律方面的一脉相承。在把握经济思想主线的基础上,《通史》在写作过程中,突出了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的特点。编者在每一章的开头部分都用评述性的语言对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了描述,在介绍完思想家的基本情况后,都进一步补充说明思想家之所以产生特定思想的缘故,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分析评价。这种论证方式贯穿于全书的始终。除此之外,《通史》还非常注重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在深刻揭示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发展演变规律的同时,注重从中寻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的内容,因而《通史》给人以强烈清新的时代感和“古为今用”的辩证意识。

赵先生主编的《通史》不愧为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里的一部鸿篇巨制,在史与论、史与实方面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我国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可以预见,在《通史》的带动下,我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必将迎来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明媚春天。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金萍)